战略视角

美国的实力地位和战略调整

□王缉思

在未来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美国的综合国力仍将雄踞世界首位。美国的自然资源条件得天独厚，又一直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和国土资源保护；美国有3亿多人口，年龄结构合理，没有面临日本、欧盟主要国家、俄罗斯的老龄化难题。美国得以发展强大的诸多因素，如法治体系、创新机制、自我纠错能力、社会凝聚力、相对平衡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互补、教育水平与人才优势等，都未出现明显变化。

同过去相比，美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技术实力、高等教育水平等“可衡量的指标”将继续上升。例如，美国在开发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步。页岩油、页岩气的开发，使美国的能源自给率已超过80%，并且还有大量出口天然气的潜力。截至2014年，美国的石油产量已超过沙特阿拉伯，天然气产量已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生产国。美国在继续推进“信息革命”，其“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出口倍增”等战略设想，都有实现的可能。

“唱衰美国”论调最响的是美国人自己。就可比的硬实力指标而言，新一轮的“美国衰落论”，根据主要是将美国同中国等极少数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相对比。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2000年的约30%跌落到2014年的约22%，下降了8个百分点。在同一时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则从约4%跃升至约12%，上升了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是被中国“吃掉了”。近年来，美国同欧盟主要国家、日本、俄罗斯等国的经济增长率相比，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美国的国内发展战略和政治生态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其总趋势有利于美国重振经济，纠正社会发展的失衡。但是，国内政治左右“极化”的趋势并无好转，两党相互攻讦、相互掣肘、相互否决，严重制约了经济革新与社会进步。美国国内贫富差距继续加大，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并未随着经济复苏得到明显提高，社会福利缺口巨大，贯彻全民医保方案困难重重。金钱操纵政治的弊端进一步暴露，而且没有任何可行的整治方案。随着新移民的大批涌入，种族矛盾重新浮出水面。凡此种种弊端，都不可能在未来几年得到明显纠正。

虽然从世界各大国硬实力消长和自身发展的角度看，美国并没有走到国力衰落的不归之路，但美国对全球事务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明显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一是美国的欧洲盟友实力受损，日本经济长期低迷，西方整体力量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下跌。二是中国等新兴大国力量和国际影响的快速上升。三是在网络化时代国家权力分散下移，全球治理问题日益复杂，美国在反恐、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问题上掌控国际规则的能力受到削弱。四是美国集中精力于国内事务，干预外部事务的信心和动力减弱。近来美国经济势头强劲，更多依靠的是内需而非国际市场，更加强了美国的“内向”趋势。

自奥巴马2009年入主白宫，6年来，美国全球战略发生了以下五方面的重要变化。

首先，抛弃了小布什政府以反恐为第一要务的国家安全战略，重新回到“经济优先”原则。围绕经济优先的原则，奥巴马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新政”计划，包括《金融稳定计划》《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计划》等一系列长短期结合的救市措施，同时从2010年开始实施“出口倍增计划”，即五年内实现出口总额翻一番。奥巴马政府一改布什政府对区域贸易协议谈判的消极态度，先后于2008年、2013年启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谈判。如果这两大体系的谈判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将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其次，吸取了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的深刻教训，实行战略收缩，使用武力更为慎重。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得不偿失，严重消耗了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已经成为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朝野不言自明的共识。奥巴马弃用“反恐战争”一词，不再提“先发制人的打击”，声称美国“不是与某种思想或宗教作战”，主张反恐战略应当“运用美国的各种力量而不仅仅是军事实力”。奥巴马政府将防止核扩散和核恐怖主义作为国家安全的首要目标。提出了“无核世界”主张。

与里根以来的前几任总统相比，奥巴马在使用武力方面是最为谨慎的。他避免直接使用武力推翻叙利亚现政府，或用武装入侵来胁迫伊朗和朝鲜放弃核计划。在利比亚战争中，美国没有冲到第一线。奥巴马政府宣称“世界不能期待美国独自做世界警察”。2014年，对“伊斯兰国”军事行动的犹豫不决，再一次证明了美国对海外武装干涉的慎重态度。

再次，重新评估在中东等地区强力推动“民主化”的可行性和后果，将维护世界秩序和地区秩序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将振兴国内经济作为执政第一要务，需要稳定的世界秩序保障。稳住中东乱局，缓和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是奥巴马上台时的初衷。但是，从2011年“阿拉伯之春”推翻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到2014年“伊斯兰国”的异军突起，都打乱了美国稳定中东的长远构想。美国军事占领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后，实行了事实上的直接统治，强行推行“民主选举”，这是美国对外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行动，结果却事与愿违。美国逐渐认识到，西方民主法治在那些国家“水土不服”，那里的部族、教派纷争和伊斯兰观念远非美国能掌控、“改造”，而伊斯兰国家“民主化”的结果，很可能是伊斯兰激进势力而非亲西方势力掌权。因此，美国虽然没有放弃以自己的价值观改造世界的幻想，但在实践上已经更多地强调世界秩序的稳定。

复次，更加重视非传统安全威胁，强调全球治理和国际机制建设，发挥“巧实力”。奥巴马政府对网络安全、传染病防治、气候变化、移民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重视程度远超历届美国政府，努力在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之间寻求平衡。在国防预算紧缩等压力面前，奥巴马削减了多项大型武器研发和购买项目，加大对特种战、网络战、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的投入。美军事战略重点已由传统的以打大规模常规战争为主，转向兼顾应对恐怖主义和小规模局部战争。在外交上，美国政府不时显现出灵活妥协的一面，注重国际形象，如改善了同古巴的关系，在伊朗核问题上做出较大让步，等等。

最后，战略重点向亚太地区转移。“重返亚洲”和面向亚太的“战略再平衡”，是奥巴马政府6年来政策调整的方向。亚太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中国军事实力的迅速增强，是此项战略调整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中东动乱、“伊斯兰国”、乌克兰危机等问题的突现，“亚太再平衡”实际上“雷声大雨点小”。美国主要靠加强双边安全同盟、利用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矛盾维护地区霸权。

总的来看，美国全球战略的上述调整不是奥巴马政府的短期行为，而是代表了致力于大国合作、维护现存国际秩序的一种长远趋势。美国不会放弃它的全球霸权图谋，但其谋求霸权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现正处于美国特色的“韬光养晦”阶段，既有力不从心的一面，也有自愿收缩、“心不从力”的一面。

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对中美关系利大于弊。中美在全球治理、经济复苏、金融稳定、反恐、防扩散等领域的利益汇合点有所增加。美对我国的外交和政治压力可能减轻。只要我国妥善处理同日本和其他周边国家的矛盾，同时拉近同欧盟、俄罗斯的距离，保持中美高层交往的势头，中美关系应可保持平稳。



（上接第1版）

记者：请问这些方面有哪些比较好的例子？

王作安：比如，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佛教、道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演讲中说：“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范文澜先生晚年得出一个结论，不懂得佛教，写不好中国文化史。道教是我国本土宗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影响十分深远。鲁迅先生说，中国文化的根底全来自于道教。所以，要鼓励佛教、道教界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方面做出贡献。

又比如，在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方面。2012年，国家宗教局会同中央五部门下发了《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对促进宗教慈善事业起到了积极作用。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有深刻的信仰基础、悠久的历史传统、较高的社会公信度，可以有所建树。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也是宗教释放正能量、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一种重要实践形式。

再比如，在开展民间外交方面。我国的佛牙、佛指舍利是佛教圣物，在各国佛教徒心目中有着神圣的地位。这些年来，佛牙、佛指舍利先后应邀赴缅甸、泰国、韩国等国家供奉，受到这些国家佛教徒的热烈欢迎，参拜者都达到数百万人，盛况空前。佛教已经成为我国人民与周边佛教国家人民之间的友好纽带。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先后赴印尼、土耳其、马来西亚等国举办“中国伊斯兰教文化展演”活动，向伊斯兰国家展示了我国穆斯林的生活风貌。中国基督教协会先后赴美国、德国等国家举办“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增进了西方国家人民对我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的了解。

重视培养爱国宗教教职人员队伍

记者：做好宗教工作，需要大量人才，在培养爱国宗教教职人员队伍上，我们需做好哪方面工作？

王作安：做好宗教工作，关键是培养爱国宗教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重视培养爱国宗教教职人员队伍，采取有力措施提高宗教界人士素质，确保宗教组织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教人士手中。”暴恐分子为什么要丧心病狂地杀害新疆喀什居玛·塔伊尔大毛拉？就是因为居玛·塔伊尔大毛拉等爱国宗教人士立场坚定，有影响力，信教群众听他们的话，这让暴恐势力感到恐惧。爱国宗教人士在信教群众中有着重要影响，做好宗教工作需要发挥他们的独特作用。当前，我国一些地方信教人数增长较快，但宗教教职人员的培养跟不上，必须重视解决这个矛盾。要通过各种途径，培养一支爱国的宗教教职人员队伍，引领信教群众爱国爱教、正信正行，引领宗教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正确道路。尤其是宗教问题突出的地区，要从战略高度制定规划，培养一大批爱国宗教人才，这是长远大计。我们要支持宗教团体办好宗教院校，培养各类合格的宗教人才，为各宗教的健康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各级党政领导要同宗教人士交朋友，在思想上关心、在政治上帮助、在生活上照顾，使之成为政治上靠得住、学识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从、关键时起作用的真诚朋友。

金融危机以来的美国经济政策

□甄炳禧

金融危机以来，奥巴马政府出台相关经济政策及产业政策，推进金融、医保、移民改革，在刺激经济复苏、修复美国经济金融体系的同时，促成并打造了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为未来经济持续增长夯实了基础。

采取大规模财政刺激举措

2009年2月，奥巴马上任伊始签署了规模达8080亿美元的《经济复苏与再投资法》。这是美国空前庞大的刺激计划，为期两年实施，实际投资开支为7830亿美元。2010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税收减免、失业保险重新授权和就业机会创造法案》，实施法案的开支为1890亿美元。2012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中产阶级税收减免和就业创造法案》，并拨款1250亿美元用来实施该法案。

此外，奥巴马政府还采取其他中小型规模的刺激措施，如旧车换现金计划、临时工资免税延长法案等。

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措施

非常规货币政策包括超低利率和量化宽松两大部分。

从2008年12月16日起，美联储开始实施超低利息的政策，将联邦基金利率降到0~0.25%区间。

从2008年11月至2014年10月的6年里，美联储实施了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共印发美钞39400亿美元，购买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

推进经济社会重大改革

金融监管体系改革。2010年7月21日，奥巴马总统签署了全面金融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主要包括：扩大美联储的金融监管权限、设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制定更加严格的美国银行业资本金标准、规范金融衍生品交易、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以及适度限制美国金融机构高管的收入。

医疗保险体制改革。2010年3月，奥巴马签署了《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主要包括：规范私人保险市场、强制性全民参保、建立“医保福利计划市场”、增加雇主的责任、扩大医疗援助计划福利的覆盖面、创设“医疗保险费率管理局”。

移民政策改革。2013年初，参议院跨党派“八人帮”提出了移民政策改革方案，包括：加强边境安全及建立途径让无证游客身份合法化、吸纳外籍精英、核查求职人士身份以及设立客工计划。但这一计划因未获得众议院的通过而暂时搁浅。

房贷机制改革。一是推出了“房主可支付和稳定计划”；二是出台“住房可支付重组计划”；三是实施“稳定房价变更计划”；四是提出一揽子解决住房问题的房改“新政”。

培育新经济增长点

扶持新能源和非常规能源革命的政策。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实现减排目标，奥巴马政府大力发展新能源，扶持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并建立智能电网。奥巴马还计划在2010—2020年向清洁能源领域投资150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因势利导支持页岩油气革命：2009年初，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加快国内石油天然气资源开采的计划；2012年6月，奥巴马政府宣布开放更多的北极和墨西哥湾海域，进行海上石油开发。

着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奥巴马政府为实施“重振美国工业”战略，重点培育发展高端制造业新增长点，主要整合政府、学术界和企业界的资源，构建先进制造业伙伴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创新网络。2012年3月，奥巴马政府提出了与企业、大学、社区联袂共同建立全国制造业创新研究网络的倡议，具体要在未来10年建立45个先进制造业创新研究所。制造业创新研究所的合作伙伴包括企业、大学、科技实验室、非营利组织、联邦政府、州及地方政府等。原则上，每个制造业创新研究中心得到联邦政府资助7000万美元以上，研究中心以大于1∶1的比率提供配套资金。截至2015年1月，已启动了五个制造业创新研究所：增材制造业创新研究所、新一代电力电子制造业创新研究所、数字制造和设计技术创新研究所、轻型现代金属制造业创新研究所和先进复合材料制造创新研究所。

重视开发和应用大数据。美国在大数据技术开发和应用方面领先全球，主要得益于政府高度重视和着力推进。一是政府带头开放政府数据。2009年，奥巴马上任伊始就提出了数据开放计划《透明和开放的政府》，并创建了Data.gov网站，为美国大数据发展敞开了大门。二是从政治和战略层面看待大数据发展，制定战略并创建相关机制。2012年3月29日，奥巴马政府发布《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成立了“大数据高级指导小组”；同时，将“大数据战略”上升为国家意志，并将大数据定义为“未来的新石油”。三是制定有助于大数据发展的法律法规。2010年，美国国会通过更新法案，进一步提高了数据采集精度和上报频度，使美国数据采集和汇聚体系更加成熟。

加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为扭转美国基建落后态势，出台了多项加强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举措：一是提出设立基础设施银行计划；二是计划将改革税制和堵塞税收漏洞等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宣布成立建设美国交通投资中心，为寻求私人部门合作以支持交通基础设施的州和地方官员提供技术援助。

设立国内国际经贸新机制

出口倍增计划。2010年1月，奥巴马政府出台了“出口倍增”计划，提出在未来5年内将美国贸易总出口额翻一番，由此带动经济增长并解决200万个就业岗位。这一计划涵盖两方面内容：一是设立“出口内阁”，包括国务卿、财政部长、农业部长、商务部长、劳工部长等14个部门领导；二是实施多项重点任务，包括扶持中小企业出口、提供联邦出口援助、加强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贸易协调以及促进服务出口。

“选择美国”计划。2011年6月15日，奥巴马推出了“选择美国”计划，并创建了跨23个部和联邦机构的“选择美国”项目办公室，旨在利用联邦政府的资源和能力，推动全世界各地和美国本土企业扩大在美国的投资，同时，协调各州和地方政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活动，为美国经济和就业增长创造良好的环境，也是奥巴马政府吸引制造业回归本土的重要举措。

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的谈判和签署，推进全球贸易投资新规则的构建，以提升美国经贸地位和竞争力。TPP经过19轮谈判后，虽存在不少分歧，但已经在许多领域基本达成共识。迄今TTIP已进行了6轮谈判，取得了一定进展，特别是第5轮谈判以来，双方进入文本谈判阶段。

通过“20国集团”（G20）机制与新兴经济体携手合作，倚重和调动后者力量，以支撑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稳定，并维护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主导权。截至2014年，G20共举办了9次峰会，发挥了全球治理主要平台的作用。未来G20将逐步实现建章立制，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趋势也将难以逆转，但由于主要经济体经济发展和政策走向分化，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依然充满变数。

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几点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美国改革经济社会体制、培育和塑造新增长点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和外部经济环境变化，与时俱进，制定和完善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机制和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扩大内需打造新增长点。为摆脱经济“大衰退”，美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采取了非常规财政和货币政策，并打造新增长点；同时，国内体制健全也“功不可没”，美国国内消费是增长的主动力和防范外部冲击的主堡垒。我国在加快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保增长和惠民生的同时，亟须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培育和打造新增长点，夯实我国经济发展和实力壮大的基础。

金融改革与稳健至关重要。金融危机促使美国对金融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既管控住资本不受监管的“任性”，又恢复了金融体系的活力和功能，为美国经济复苏和增长提供重要的资金资源。我国宜加快完善国内金融体系建设，采取金融改革、开放和监管“三管齐下”，加强防范金融风险的机制和能力建设。

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着眼新一轮产业革命，加快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重点扶持高端制造业，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着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运用大数据提高各行业经营效率和生产率，努力培育产业新增长点。依靠创新驱动，加快从国际产业分工低端向高端迈进，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中国创造”的飞跃，引领和支撑我国经济增长。

以新能源革命为契机，强化能源生产和能源供应安全。多渠道扩展能源资源生产，开采利用非常规能源，充分挖掘其他资源潜力，加快发展可再生、替代和清洁能源，提高能效，节能减排，塑造新能源增长点。同时，多管齐下保障能源安全，提高能源供应多元化，加强国际能源合作，加大能源外交力度，保护我国海外能源生产基地和运输线安全，提高我国在全球能源领域的定价权和影响力。

将经济实力转化国际影响力。在主要经济体对我倚重加大的新形势下，发挥我国市场和资金优势，加强国际务实合作，经营好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中国主导的国际经济金融合作机制，以潜移默化和积水成渊的精神，扎实、逐步和稳妥地推进世界经济秩序的重塑。

积极参与并引领国际规则制定。增强我国话语权，实现从国际规则的适应者和遵循者向制定者和引领者的角色转换。引导新兴市场国家和周边国家团结谋划，推动新规则制定朝着普惠和“共赢”的方向发展。鉴于TPP商签步伐加快，我国宜着力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商签及与TPP的对接，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建设进程。

加强中美务实合作，共同引领世界经济新一轮增长。中美是近期主要经济体中经济增长较强劲的两大经济体，也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应继续善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双边协调机制和G20等多边治理机制，在加强协调合作和管控分歧的同时，积极寻找、培育并打造中美两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新增长点，引领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发展。创新、深化和拓展双边合作领域，为构建新型中美大国关系注入丰富务实的经济内涵。在加快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促进美公平对待我国企业赴美投资经营，放松对我国技术产品出口，加强两国在非常规、可再生等能源部门、先进制造业、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做大中美经济利益“蛋糕”，造福中美两国并惠及世界各国。

他山之石